

中国进步事业的英国教授

赖朴吾：终生支持

□ 吴耀明

赖朴吾（Ralph Lapwood）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中国任教近20年，一直支持和帮助进步学生运动，到华北抗日根据地会见过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萧克等八路军将领和白求恩大夫，参加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及其国际委员会工作，回国后继续关心中国发展，为增进中英友谊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中国的希望在解放区”

1909年，赖朴吾出生于英国伯明翰，1932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上海，先在麦伦中学任教，认识了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防火督察的路易·艾黎，受其影响带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参加救灾、治病等社会实践活动，接触到了中国底层的工人、农民，对他们遭受的贫穷和苦难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开始形成关心大众、追求进步的思想。1936年，他到北平燕京大学数学系任教，因备课仔细、教学认真、循循善诱而深受学生好评，培养了著名物理学家黄昆、数学家关肇直等大批人才。

1939年7月，因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的残酷统治，又受到老朋友艾黎加入“工合”（工业合作协会）的邀请，赖朴吾在地下党安排下穿过日军封锁线，经解放区前往大后方，同行的还有同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友人林迈可。他们先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受到萧克热情接待，随后前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见到聂荣臻和白求恩，又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与朱德、彭德怀会谈，最后南渡黄河再乘火车到西安。他们历时三个月、辗转千里，一路跋山涉水、穿越险峻峭壁，不畏艰辛、克服困难，才得以完成行程。白求恩为赖朴吾途中受伤的脚做了手术，赖朴吾则帮白求恩整理擦洗手术器械；朱德赠给赖朴吾一件棉衣，还把手表交给他带到后方修理。白求恩的高超技术和惊人毅力，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谦虚耐心的态度，彭德怀、聂荣臻、萧克等对八路军英勇战斗的介绍都给赖朴吾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解放区，赖朴吾感受到了八路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官兵一致、军民一心，认为“那里没有大贫大富，是经济平等、政治民主的”，解放区充满“一切为了前方、一切为了抗日的牺牲精神”，对共产党在异常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日表示深深敬佩。到大后方后，赖朴吾对共产党倍加赞扬，在报告中称八路军为“人民的军队”，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们真是了不起”的感

叹，明确告诉世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

支持并参加中国进步事业

赖朴吾在西安和林迈可分别后，前往宝鸡与艾黎见面，并留在“工合”担任视察员工作。他跑遍了“工合”西北区、川康区和东南区，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合作社业务开展状况、账目情况，搜集原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形成有说服力的报告，并帮助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对“工合”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也促进“工合”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募捐和支持。直到40年后他还提供重要线索，使“工合”收回了一笔29万港元的资产。1940年，赖朴吾与在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姑娘齐兰畦结婚，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齐兰畦也用一生支持赖朴吾的事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的燕京大学被迫停办，次年，在大后方成都复校。赖朴吾回校任数学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不但承担教学任务、处理院务系务，还负责联络其他院校，并兼任“工合”部分工作，他总是不计得失、任劳任怨，对燕大的师资建设和工作生活环境改善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解放区的见闻和在大后方看到的腐败景象进行对比，他对共产党更加敬佩，大力支持地下党在燕大的活动，让进步学生团体在其家中召开秘密会议，为民主学运提供了掩护和便利。赖朴吾向学生们介绍在解放区的见闻，拿出大量带回的照片、报刊等向大家展示宣传，对他们说“那里的人民很有信心与勇气，很有精神。见到他们，你就会相信日本人绝征服不了中国”，这让更多爱国学生认识并向往解放区，促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5年，赖朴吾回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返回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帮助解决困难学生生活问题，并协助学生开展护校运动和迎接解放。北平西郊解放后，燕京大学进步师生冒着严寒到石景山钢铁厂与解放军联欢，他作为唯一的外国人获准前往参加。1949年4月，渡江战役期间，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挑衅炮击解放军，赖朴吾和几位英籍同事联名给英国政府写信，指出责任在英方。从开国大典到1952年回国，赖朴吾每次都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五一”“十一”的游行。抗美援朝期间，他向中国捐款，表示“抗美援朝是正义的战争，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愿意尽一份力量”。对香港问题，他多次表示“香港应当无条件归还中国，那是过去霸占的”。这都表明他衷心地希望中国富强、进步，也将终生投入到中国进步的事业中来。

致力于增进中英人民友谊

1952年，在征求好友李约瑟和艾黎的意见后，赖朴吾夫妇决定返回英国，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宣传中国，在给燕大的辞职信中写道：“由中英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认为在将来的数年中，我们工作地点应当在英国。”赖朴吾回国后到剑桥大学任教，直至1976年退休，在数学、地球物理学、地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曾任英国地震学协会副主席、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英国首席代表等职。

赖朴吾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回国后依然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为增进中英友谊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赖朴吾夫妇合写的《经历中国革命》出版，这本书销售很广、影响颇大，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了解中国的必读书，对帮助外国人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起到了很大作用，其观点曾被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多次引用。赖朴吾夫妇还经常在英国各地演讲，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和进步，讲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的力量”，促进英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赖朴吾夫妇多次来中国访问，每次都把亲眼所见中国的巨大变化传达给英国人民。1984年，在最后一次来华访问讲学期间，赖朴吾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嘱咐家人“唯一的希望是把骨灰埋在中国”。按其遗愿，赖朴吾的骨灰撒在了燕园未名湖畔一个幽静的小山坡上。

赖朴吾一生致力于中国进步和促进中英友好，其事业从中国开始，到中国结束，并将在中国永存。



印度汉学家强基·波拉普：“以译传道”架设友谊之桥

□ 张韶梅 苏 阳

强基·波拉普（Janaki Bal-labh，1928—2022年），印度杰出的汉学家和精通中文翻译的文学家。强基·波拉普于1928年出生在北阿坎德邦阿尔莫拉区达拉科特村，1947年至1952年在德里出版的印地文时报《英雄阿因那》报社编辑部工作。1952年至1956年在印度军队出版的《画报周刊》印地文版编辑部工作。1956年，强基·波拉普在德里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携全家从德里来到北京，在外文出版社担任外国专家。后将一系列中文作品翻译成印地语。他的妻子沙玛也成为北京广播电台第一位印地语播音员。强基·波拉普翻译了许多中国重要的文学作品，并在印度广泛流传，他毕生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与中国人民建立了长久深厚的友谊，架设友谊之桥，成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使者。

“以译传道”

1950年，中印两国建交。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一时期的印度，“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五项原则）家喻户晓，中印关系处于热烈友好的黄金时期。强基·波拉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启他一生搭建中印友谊之桥的美好历程。

强基·波拉普年轻时与时任总理尼赫鲁的秘书潘迪特·拉尔关系密切。在潘迪特·拉尔推荐下，28岁的强基·波拉普以印地语专家的身份于1956年10月来到中国。他精通印度教教义和梵文，这帮助他成

为记者并在后来成为作家和中国作品的翻译家。

强基·波拉普希望印度人不仅了解中国政治，还了解中国文化，因此认为用印地语翻译中国作品很重要，这样中国作品才能触及更广泛的印度读者。他恪守成为印中桥梁的承诺，毕生都在努力让印度人了解中国，并以同样方式尝试让中国人了解印度。他在中国外文出版社印地文组工作至1961年底。1963年12月至1977年11月，他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在此期间积极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印地文版翻译工作。1977年至1982年，他再次来到外文出版社印地文组工作，承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印地文版改稿工作及十一大文件定稿工作。

强基·波拉普的作品在中国和印度受到好评。他还翻译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以及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部分作品。强基·波拉普退休后开展了更多翻译工作。2017年，他完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翻译，在90岁高龄时又完成了第二卷的翻译。

获得最高“和平友谊”奖章

强基·波拉普有一位人生偶像，那就是印度著名医生、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柯棣华医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援华医疗，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感动着强基·波拉普。因此，毕生致力于中印两国和平共处和友好交往，就成为强基·波拉普自上世纪50年代访华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1961年，鉴于强基·波拉普对中印文化交流的突出贡献，周恩来总理

亲自授予他“和平友谊”奖章。这至高无上的荣誉无疑给予了他更强的动力和更高的使命感。

在担任印中友好协会秘书长期间，强基·波拉普致力于促进两国友谊。他坚信中印应该是朋友和伙伴。强基·波拉普还曾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过，从中国大使馆卸任后，他与印度工会中心（CITU）取得了联系，凭借多年在国际事务工作中的广博知识和对华交流的宝贵经验，他不仅帮助CITU与各国工会运动建立了联系，拓展并完善了CITU的国际部事业，更借助新的平台继续促进印中友好交流，促成了CITU的北京访问之行。

薪火相传中印友好“宝贵遗产”

2022年11月12日，第四届“新时代翻译教育的使命与中国文化传播”国际学术论坛召开，强基·波拉普的儿子——来自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中国商会会长阿都尔·达拉果发表题为《翻译和文化包容性：为构建友谊创设和谐》的演说。演讲中，阿都尔·达拉果动情回忆起曾被周恩来总理授予最高友好纪念奖的父亲强基·波拉普，回忆着父亲从事对华文化翻译工作的初心和为中印两国友好交往执着奋斗的一生。

阿都尔·达拉果1956年跟随父亲来到中国。1983年至198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他长期在中国居住和工作，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

阿都尔·达拉果仍然忙碌地奔走于父亲走过的那条中印友好交往的大道上。他始终铭记着父亲的重要观点，“与中国互动并实行对华友

好政策很重要”，“印中永远是邻居，两国拥有28亿人，两国中产阶级总规模世界第一……与中国建立更好关系的理由有很多”。而今，阿都尔·达拉果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有了更宽广的视野、更新锐的视角，他敏锐捕捉到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建设性提出“中国外宣工作应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他盛赞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全面看亚洲和世界区域安全合作”，“这将使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和共同的光明未来！”

阿都尔·达拉果曾说，自己两个女儿的母语是中文，他说要将自己家族与中国共同发展的文化传承给下一代，因为他们对中国人民有一种爱，并且这爱当中总是有一部分与家族的基因相连……

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一代代老前辈们的心血和智慧。2021年5月，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办“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友人主题展”。该展览讲述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友人的感人故事，缅怀伟大友谊，致敬外国友人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有24位外国友人选，其中就有印度汉学家强基·波拉普。



“德”：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

□ 龙 倩



作为中国思想史中重要的原生概念之一，“德”字使用率极高，自周初至今，经久不衰。“德”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融伦理、政治等为一体，其创立和发展，不仅在整体上奠基了中国文化的人文走向，更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德向善的精神品格，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

（一）

从字源上看，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德”字的初形，并有多种写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𠩺”和“𠩽”两种。以“𠩺”为例，左部是“彳”，表示道路、行动；右部是眼睛，上悬一条直线，表示目光直射，可理解为循行视察、目不斜视之意，此为“德”字初义。但此时的“德”并不具备后世惯常使用的“道德”含义，且从属于殷商的宗教神学。周初维新变革之后，“德”观念才真正脱颖而出。至西周晚期毛公鼎铭文中的“德”，在“目”下加一“心”字符，意味着目正、心正才算“德”，暗示着“德”的内生化，象征着它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意义拓展。

当甲骨文的德字演化到金文的德字时，中国古代社会也相应地由神文时代走向人文时代，开始了人文祛魅的历史进程。据《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

（二）

在《书》之《誓》《诰》及《诗》之《雅》《颂》诸篇什中，周人反复论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了德，上可得天之助，下可得民之和，而失了德，则天不佑、民失和，故不论是夏人、殷人，还是周人，都应当全力修德，以自求多福。周人更当自觉以此为戒，故《尚书·召诰》有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这就是说王朝在受命之后能绵延多久，是无法预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敬德”。周人不仅通过“德”谱写了夏商周的政权更替历史，为其增添了更多的伦理道德性，对当时许多宗教仪式和宗教实践都进行了人文祛魅，如马王堆帛书《周易·要》

所提到的“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德”观念的酝酿与发展，使人更多关注人本身道德的自觉和自律，从整体上奠基了中华文化的人文走向。

（三）

作为周朝立国基础的分封与宗法制度，从一开始便与“德”相关。不论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还是《左传·隐公八年》所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昨之土而命之氏”，均可作证，无不说明周王朝封建背后的“尚德”动机。这种封建宗法制度以伦理为纽带，在天然血缘的自然基础上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结构。基于此，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使为臣下者，由敬祖而敬宗子，而敬国君以至天子；为君上者，由敬天敬祖，以爱同宗同族以至百姓庶民。于此，家庭、社会、政治、宗教、礼乐融合一体，在一片和谐有序的伦理氛围中可使诸侯不致相争，天下趋于安定。王国维也据此指出“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道德之团体”，因此，“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可以说，西周的礼乐制度为中国成功地建立了文明社会的道德政治秩序和伦理生活范式，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伦理型文化的根基。自春秋以降，西周的宗法制度虽渐趋式微，但宗族、家庭作为宗法制度的遗存，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且在孔子“从周”的努力下，直至今日依旧作为文化基因镌刻在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中，

体现于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孝亲敬长等人文传统和理念中。

春秋以后，“德”观念逐渐从统治走向具体，与敬、慎、仁、忠、勇、孝、亲等所有美好的价值和品质有机结合，成为个体美德的指称，并在儒家那里完成了“德目”的系统构筑与弘扬，最终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德向善的精神品格。崇德向善内在地包含了崇德和立德双重含义，既包括理念层面对道德的尊重与高扬，也包括实践层面对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儒家那里，孔子就一贯重德，强调德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甚至在与外族交往中，也要“修文德以来之”。到了孟子，更是将道德视为人禽之别的根本所在，并将仁义礼智置于人内心，在著名的鱼和熊掌之辨中推出“舍生而取义者也”的浩然正气。《大学》则对修养立德提出了“三纲”“八条目”的层层递进之方，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目的便是为了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以修身为基础和前提。在“八条目”中，“修身”成为连接“内圣”与“外王”的关键枢纽。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崇德向善、修身养性，崇尚气节和个人情操，就成为历代贤能圣哲、仁人志士立身处世，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形成了诸如“厚德载物”“崇德尚义”“杀身成仁”“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在传承中哺育着民族的性格，塑造着民族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标识。